

“符号学研究”专题主持人语:

法国、美国和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符号学研究最具代表性和引领作用的三个国家,而中国正以符号学“强国”之身屹立于世界符号学之林。《法国符号学的过去与今日》一文透析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细致梳理法国符号学的思想基础,对系统论符号学时期(包括整个结构主义活动时期)及巴黎符号学派或“叙述论符号学”时期进行了比对分析,勾勒出了法国符号学的发展史迹。《美国符号学纲要》一文关注美国符号学思想史的流变,尝试选取另一种视角和维度来梳理美国符号学的发展历程,凸显其为现代世界符号学学科发展建设所做的贡献。《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理论特色》一文从文化符号学的莫斯科语言学传统和圣彼得堡文学传统谈起,关注不同文化符号对象的文本地位和结构—功能特征,深刻剖析俄罗斯符号学的认识论和文化论立场、符号学路线、研究范式以及研究方法,发掘不同文化符号系统运作的共性规律和规则。中国是一个具有符号学研究传统的国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符号学学术资源独特、丰富,其现代符号学思想既包含了西方的跨媒介、多媒体、多语式、语象叙事的符号学精髓,又吸纳了中国古老的“中和”“意象”哲学传统,进而形成了具有东方特征的符号学范式——语象合治符号学。《中性与中国符号学思想史》一文展示了两个符号学视域,一是外部的中西符号学,二是内部的古今符号学,作者紧紧围绕符号学的“中性”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一场从“意义世界”出发的跨时空对话,并通过对比分析确立了中国符号学的应有地位。

——王铭玉

法国符号学的过去与今日

张智庭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法国符号学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符号学研究中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文章旨在从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之中厘清法国符号学产生、发展的脉络和今后的发展前景,明确说明其前后两个发展时期的研究内容,并对两个时期符号学名称的汉语译名发表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系统论符号学;叙述论符号学;传播符号学;结构;意指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2)04-0001-12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符号学在欧洲迅速发展起来,至今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路程。法国符号学在欧洲符号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欧洲大陆符号学研究的代表。法国符号学的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系统论符号学时期(包括整个结构主义活动时期),第二个时期为巴黎符号学派或“叙述论符号学”时期。两个时期有交叉,因为后期曾经作为前期研究的一个分支存在,前期的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后期的参照和研究基础。

收稿日期:2022-04-11

作者简介:张智庭,男,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法国符号学研究。

引用格式:张智庭. 法国符号学的过去与今日[J]. 外国语,2022(4):1-12.

1 方法论基础

谈论法国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自然要从符号学理论所依据的“结构”概念说起。

法国学者多斯(Doss)在《结构主义史》(*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 I, II*, 1992)一书中说,“结构”(拉丁文:structura)一词最早指的是一种建筑学意义。1771年出版的《特雷乌词典》(*Dictionnaire de Trevoux*)对该词的解释是:“建筑物赖以建筑的方式。”17—18世纪该词意义发生了变化,并扩展到人类方面:在丰特内尔(Fontenelle)看来,人的肉体就是一种建构;而在德·沃格拉斯(de Vangelas)看来,语言也是一种建构。于是,“结构”一词被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对于一种存在物,描述其各个部分到整体的过程就成了对其结构的研究。“结构”真正进入人文科学领域是与19世纪的斯宾塞(Spencer)和马克思的著述分不开的,而它最终在人文科学中得到确立则见于迪尔凯姆(Durkheim)的《社会学方法规则》(*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1895)一书。“结构”一词被拉朗德(Lalande)在《哲学的技术与批评词汇》(*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一书中用来为1900—1926年出现的一种新的心理学派命名:结构主义,以区别于20世纪初期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功能心理学派。

当然,“结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人们采用,以致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研究对象,并导致结构主义活动的产生,则是人类社会寻求科学发展的倾向和批评意识在人类思想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位置这两个方面相结合的产物。19世纪末,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西方世界一定程度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拒绝和对寻求新模式即新认识论的现代主义的渴望,而系统论的严格方法学思想恰好迎合了这种要求。法国哲学家瓦尔(Wahl)在其《哲学结构主义》(*Le structuralisme en philosophie*, 1968, 1973)一书第一章《有无一种结构认识论?》的开头部分就指出:“我们如此提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非无缘无故,因为我们在认识论名下寻找的……是19世纪曾被称作有关新科学的方法论。”(Wahl, 1973: 17)他对这种认识论作了这样的描述:“许多被掩盖的、扭曲的秩序,以其连接方式承载着多种多样的话语,而系统论恰恰可以让我们学会去认识它们,一种认识论便是这些秩序中的一种:真正地讲,认识论就是知识的一种深在组织机制,它有可能在方法上提供一定信息,比如提供该信息在一个时代或在科学的某种语域中的无意识构架。”(Wahl, 1973: 17)当时,人们的猜想便是:这种存在于我们的言语“表面自由性”中的某种东西“是否首先在并不显现的情况下,就主导着诸多科学的出现?说得明白一点就是:“难道就不存在一种知识结构,它可以解释系统论的出现和界定其有效性的领域吗?”(Wahl, 1973: 17-18)对于这样的一种认识论,福柯在其《词与物》(Foucault, 2016: 13-14)中将其称为“关于科学的考古学”,而对于这种考古学的操作则是:这种考古学是对五个世纪以来主导着知识事业一系列的排列呈现或排列原则(认识论)的一种标记,这一系列的呈现或原则的不连续性,都必然导致所有科学之“伪进步”史出现错误。福柯说,从文艺复兴至今,人们对于欧洲几乎没有间断过的一种运动有过印象,而在观念和主题层面上的这种连续性大概只有一种表面效果;“在考古学层面上,人们看到的是,各种实证系统均大大地改变了……事物的存在方式与在分配事物的同时将它们提供给知识的秩序方式,已经深刻地变化了”(Foucault, 2016: 13-14)。这似乎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于这种认识论即结构的最初设想,而且根据后来的格雷马斯(Greimas)的研究结果,认为19世纪已经为此建立起了一套描述程序(Greimas, 1985: 12)。

2 社会学和现象学基础

法国符号学的产生与发展还有着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著名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

劳斯(Lévi-Strauss)1950年写的《莫斯著作导论》(*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一文,使我们了解到,早在他之前,社会学研究领域就已经存在着有关结构的种种观点。莫斯(Mauss)被认为是法国人种学的奠基者和现代人类学的先驱。他在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中不大注重发生论方面的研究,而是寻找个体所属关系和社会在深层次即在无意识方面确定人的各种决定性层次。他在称为“整体社会事实”的研究中,认为不能只依靠一种层次来看待社会生活的某些现象,因为这些现象“动摇社会和其机制的整体性,它们既是司法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和宗教方面的,也是美学方面或象征方面的,它们是一些整体”(Baroquin et al., 2007: 262)。他认为,社会生活构成一种系统,该系统的所有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早在1924年,他就把社会生活确定为具有诸多象征关系的一种世界。莫斯在多种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建立联系,以表现“一种整体的人”,而这种人的各个方面组成一种具体的和个体性的统一体。他提出“形态学”和“生理学”等观念,这些观念使得“习惯”成了社会现象的决定因素。他最著名的分析,见于他的著述《论赠品——古代社会中的交换形式与理据》(*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ïques*, 1923—1924),他在书中阐述了赠品的社会基础。他认为,馈赠就像是一种原则,该原则迫使个人或社会群体维持一种财富的循环,或者接受或者拒绝。即便在近现代社会,馈赠的社会基础也得到了验证,交流是象征性地通过多方面来决定的,而非只是功利性的。该书中阐述的相互性理论为列维-斯特劳斯后来研究亲属关系提供了模式。所有这些观念,都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作了铺垫,而他为莫斯著述撰写导论,是因为他在莫斯的著述中看到了这位人类学结构主义精神之父的存在,并且,他这样做也被认为是借机在确定其个人的作为严格方法论的结构主义研究计划。

迪梅齐(Dumézil)是法国著名语文学者和印-欧神话与宗教研究者。他很早(1938年)就发现,许多印-欧神话叙事都是根据一些相似的叙述结构组织在一起的,而由这些叙事所表述的神话反映了根据三种功能组织起来的有关社会的一种概念,它们是神圣与权威功能、战斗功能、生产和再生产功能。这一发现,使得他实际上成了结构主义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因为他后来一直围绕以这三种功能形式出现的被他称之为“周期”“系统”和“结构”的组织图示,来解读西方的文化历史。迪梅齐被认为不曾有过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背景,他更属于历史比较语言学派。这一学派从19世纪初就设定在以印-欧语言为母体的所有语言之间存在着亲属关系,迪梅齐恰是根据这种设定获得了他的转换概念,而这种概念很快就成了大多数系统论著述的核心概念。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他不了解现代语言学,他对于索绪尔后继者们的著述还是熟悉的,尤其是对于梅耶(Meillet)和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的著述了解较为深刻。为了掌握模式的变化,他后来也使用了结构语言学经常使用的“区别”“相似”“对立”等概念,人们会比较容易地在他的著述中注意到依据这些概念确立的一些结构模式:相似性的建构、结构实体(三种功能)与其各种变体(史诗变体或历史变体)之间的对立、同时性与延续性之间的对立。虽然迪梅齐本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比如他说过“我不是、不需要是或者也不需要不是结构主义者”(Dosse, 1992: 50),但人们还是把他归入了这一流派的开拓者之列。

20世纪50年代,法国哲学研究以现象学为主,这种研究承袭了胡塞尔返回“事物本身”和其相关方面、把哲学从意识形态过渡到科学的理论主张,注重事物的实际与具体性。不过,这种注重并非只是拘泥于事物的现象,而是探究在意识相对于其对象的各种接受可能性之中构成其基础的本质。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自己的研究中质疑纯粹意识的唯心论,越来越关注新的人文科学提供的各种意指结构。在他看来,这些意指结构同样是作为主体的哲学家重建其意义时可以

为己所用的本体论条件。梅洛-庞蒂 1960 年出版的《符号》(*Signes*)一书,让人们看到了现代语言学和人类学理论对他的影响。这部著作,收录了他 1951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现象学研讨会上发表的文章《论言语活动的现象学》(*Sur la phénoménologie du langage*)。在这篇文章中,他表现出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极大兴趣,他说:“我们从索绪尔著述中所学到的是,单独的符号无任何意味,每一个符号并不表达一种意义,而是标志这个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一种意义差异。”(Merleau-Ponty, 1960: 49)在《符号》一书中,他论述了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将两者分开的界限。梅洛-庞蒂认为,哲学家应该界定所有可能性之领域,应该解释通过社会科学所获得的经验成果,通过阐释学为每一种实证性提供意义。他在该书第四章《从莫斯到列维-斯特劳斯》(*De Marcel Mauss à Claude*)中又论述了人类学,他坚定地捍卫了列维-斯特劳斯 1950 年在其《莫斯著述导论》中制定的研究纲领:“社会现象既不是事物,也不是观念,而是结构……结构不会从社会上去掉任何厚度和重量。它本身也是结构中的结构。”(Merleau-Ponty, 1960: 146-147)梅洛-庞蒂的研究工作使得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他之前,莫斯参照哲学来定位人类学研究中的社会事实,而梅洛-庞蒂则是参照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来定位其现象学的哲学研究。

3 语言学基础

法国的符号学研究,除了热奈特(Genette)、托多罗夫(Todorov)等学者在“叙述学”(narratologie)方面作出的努力,不论是在哪一个时期,其首要理论基础都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的语言学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后来形成的欧美几个主要语言学派的研究成果,所以,法国符号学是名副其实的语言符号学。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中,把言语活动(langage)分为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认为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而不是“言语”,他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看作是“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体,把前者定义为“所指”(signifié),把后者定义为“能指”(signifiant),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需要说明的是,索绪尔在此颠覆了“形式”(forme)与“实质”(substance)的传统意义:既然语言是形式,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是言语,而言语又是对语言的运用和表现,因此,言语便是实质,于是,形式就变成了内在的,而实质则是外在的了。在索绪尔的概念里,“实质”就是包括“内容”和“意义”在内的物质表现,因为长时间以来,人们总是把“形式”理解为外在的。为了不造成混淆,法国符号学学者后来多以“结构”或“组织机制”来代替索绪尔意义上的“形式”,而在习惯上使用“外在形式”的地方代之以“外表”(apparence)。在语言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应该研究前者;他为语言符号的结合机制确定了横向的“组合关系”和纵向的“聚合关系”(或“联想关系”)。虽然他在全书中只有三处使用了“结构”(structure)一词,但是,依据这些概念而形成的结构语言学则成了 20 世纪语言学研究的主流,致使最初的法国结构主义论者也将这些概念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和概念工具,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成了这些学者们的阐释对象,从而构成主要的“结构主义活动”。

继索绪尔之后,对法国符号学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几位语言学家是:俄裔美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Jakobson)、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Hjelmslev)、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

雅各布森尚在年少时就对诗歌的语言问题感兴趣,他于 1915 年(19 岁)发起创立了莫斯科语言学派,该学派致力于研究诗歌与语言学的关系,特别是研究诗歌作品内在的结构连贯性。在此期间,他只是

从他的朋友特鲁别茨柯伊 (Troubetzkoy) 亲王那里听过有关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一些内容。当时有两名俄罗斯学生听取了索绪尔于日内瓦大学开设的课程, 是他们将索绪尔的理论带到了俄罗斯, 从而在俄罗斯较早地出现了对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探索。这两名俄罗斯学生中似乎有特鲁别茨柯伊。而雅各布森真正读到这本书是他 1920 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时候。在捷克, 雅各布森与从维也纳来到布拉格的特鲁别茨柯伊一起参与创立了布拉格语言学派 (1926), 并且担任了该学派的副主席。该学派从 1929 年开始将其研究工作的重心明确地放在结构语言学计划上: “它 (该学派) 赋予了自己结构主义的名称, 因为它的基本概念是被设想为一种动态集合的结构。” (Dosse, 1992: 76) 该学派将自己的研究工作置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框架之内, 在结构音位学研究 (特鲁别茨柯伊) 和语言功能及失语症研究 (雅各布森) 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特鲁别茨柯伊于 1939 年出版了《音位学原理》(Principes de phonologie) 一书, 他根据一个音位在音位系统中的位置来确定这个音位, 其方法就是在考虑四种区别性特征的同时, 标记语音的二元对立情况, 他说: “音位学尤其带有其结构主义的特征及其系统的普遍性。” (Dosse, 1992: 209) 在此, 我们看到了索绪尔在研究最小相关单位时所采用的方法。特鲁别茨柯伊的研究成果使雅各布森得以建立带有 12 种音位二元对立的图表, 而这些对立被认为可以阐述所有的自然语言, 他的这种研究方法也为后来法国符号学建立二元连对范畴提供了参考。雅各布森的另外两大贡献还在于: 第一, 他制订了六种语言功能: 表达功能或情绪功能、指涉功能、维系功能 (寒暄功能)、意图功能、诗学功能、元语言功能, 这些功能加深了人们对语言符号的认识, 并为传播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第二, 他后来把音位学原理应用在了对失语症的研究方面。他在言语活动的这种错乱之中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变异情况, 而这两种情况可以让人重新了解在失语症的情况下言语活动及其规律的获得机制。他把符号间的结合与词语间相互替代的选择加以对立, 从而发现替代相当于隐喻的修辞格, 而结合则相当于换喻的修辞格。这种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于索绪尔横向组合关系与纵向聚合关系 (联想关系) 的认识与理解。雅各布森被认为是法国结构主义学说的“总指挥”, 正是由于他 1945 年与列维-斯特劳斯在美国相遇和 1950 年与拉克在巴黎相遇, 使得结构主义在法国盛行了起来。

丹麦哥本哈根语言派对法国符号学理论的发展贡献很大, 该学派在继续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做深入阐述的同时, 也对符号学基础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该学派由叶姆斯列夫 (Hjelmslev) 和布龙达尔 (Brøndal) 于 1939 年创立。他们两人经常被邀参加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报告会, 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接触了索绪尔的书籍、甚至是一些手迹, 因为有学者研究发现, 叶姆斯列夫 1943 年出版的《言语活动理论导论》(Prolégomène à une théorie du langage) [实际上是与乌达尔 (Uldall) 共同完成的] 一书中对索绪尔著述的引用, 并非出自《普通语言学教程》, 而是出自后来由布凯 (Bouquet) 和恩格勒 (Engler) 整理和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札记》(Écrits de la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2002)。叶姆斯列夫把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的对立改为“系统”与“过程”的对立, 把“能指”与“所指”的对立表述为“表达平面”与“内容平面”的对立, 进而为每一个平面又分出了“形式”与“实质”。于是, 便出现了内容形式与内容实质、表达形式与表达实质、内容形式与表达形式三个方面, 而三者之间有“一种类比关系”, 他的结论是: 表达实质表现表达形式, 内容实质表现内容形式, 表达形式表现内容形式 (与前两者相比, 后者是一种反向的关系) (Hjelmslev, 1973: 67), 这其中的“形式”与“实质”仍然是索绪尔理论中的意义。这种更新了的表述对后来的巴黎符号学派的理论构建意义重大。此外, 叶姆斯列夫对符号学的分类也是比较科学的。叶姆斯列夫的符号学理论既推动了系统论符号学的发展, 也成了巴黎符号学派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从而构成了

从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到巴黎符号学派之间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以至于法国符号学学者将巴黎符号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脉络概括为“索绪尔→叶姆斯列夫→格雷马斯”。

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对法国符号学特别是巴黎符号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有关主体性和陈述活动的论述突破了系统论符号学的种种束缚,使主体和其作用重新回到了符号学发展无法避开的言语活动的行为之中。本维尼斯特在其文章中曾多次对索绪尔的一些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根本不提“语言”与“言语”的对立,而是说“语言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二元性:作为社会机制,它由个人来应用;作为连续的话语,它由一些固定的单位来构成”(Benveniste, 1974:48),这实际上是把“语言”与“言语”看成了一个整体。他还认为,“索绪尔的思想,过分肯定了语言与符号系统的关系,而不太明确语言学与作为符号系统的符号学(sémiologie)的关系”(Benveniste, 1974:49)。本维尼斯特在1958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言语活动中的主体性问题,他指出:“正是在言语活动之中和借助于言语活动,人才成为主体……我们在此谈论的‘主体性’便是可看作‘主体’的对话者的能力。”(Benveniste, 1966:259)关于陈述活动,他说:“陈述活动是由个体的使用行为对语言的运用……对话者对于语言的关系确定陈述活动的语言学特征。”(Benveniste, 1966:80)正是这些论述启发了巴黎符号学派的研究,也从而使法国符号学没有被封死在静态的系统论之中。此外,本维尼斯特有关 pouvoir(能够)、devoir(应该)、vouloir(想要)和 croire(相信、认为)几个“模态动词”的阐述,也为格雷马斯建立其包括“懂得”(savoir)模态在内的“模态理论”体系提供了初步参照。

法国功能语言学家马蒂内(Martinet)有关“相关性”(pertinence)和“双重分节”(double articulation)的理论也极大地丰富了法国符号学的理论,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的生成转换语法也影响和推进了格雷马斯理论的发展。当然,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对法国符号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的理论常常与一些符号学家的某些主张结合在一起。总之,源自索绪尔理论的各种结构语言学流派是叙述学之外的法国符号学的首要理论基础。

4 两种符号学名称及其汉语译名

首先,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采用的符号学名称 sémiologie,该词原本指疾病中的表面症候。这种定名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今天仍然被提及。这一名称是与其研究理论和研究对象密切关联的。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 sémiologie 确定为“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高名凯,1982:38),而语言学则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那么,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自然是语言。这里,我们不去重复前面已经引用过的索绪尔相关论述,而是看一看作者在书中第142页给出的一幅图示就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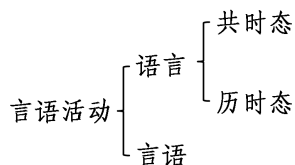


图1

不难看出,索绪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语言的“共时态”,而“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143),

在本书中,作者不下 10 次提到“语言”就是一个“系统”,如“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37)、“语言是一个系统”(46)、“一种语言就构成一个系统”(107)、“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118)、“在像语言这样的符号系统中”(156)、“只作为系统的语言”(183),等等。根据索绪尔这些论述,在其后的法国符号学研究中,多数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各自研究的语言对象的“系统”方面,即“符号系统”的组织结构方面。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学术界根据这种符号学总体的内涵给出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在这一门新学科上进行过较为深入研究的语言学家穆南(Mounin)做了这样的表述:符号学是“借助于信号、符号或象征而进行的所有传播(communication)系统的一般科学——当人们将符号学说成是有关所有传播系统的一般科学时,符号学就已经足够地得到界定了”(Mounin, 1970: 7)。法国学者吉罗(Giraud)在法国大学出版社(PUF)的“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丛书中出版的《符号学概论》(*La sémiologie*, 1983)中也这样说:“符号学(sémiologie)是研究符号系统(语言、编码、信号等)的科学”(怀宇, 1988, “绪论”: 1),并且他将这一门科学概括为“传播符号学”:在他看来,根据索绪尔在其《教程》中的观点,符号学“将是有关所有符号(象征)系统的普通科学,而借助于这些系统人类在相互之间进行交流(传播)。而被援引的例证(文字、聋哑人的盲文、军队或海军的信号)都是显性的”(怀宇, 1988: 11)。在这里,“显性的”提法明确地告诉我们,所谓的符号学就是以各种明显的符号为基础结合而成的传播学。也许,正是根据这样的主张,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有意无意地就将符号的能值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理解成能指在上、所指在下或者说是能指重于所指的情况,于是便出现了以能指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多种尝试,比如对于徽章、交通信号、海军旗语等系统的研究。不过,穆南也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和巴特的研究则有些忽视外显符号,更倚重符号的所指及依此产生的意指,在他看来这属于“意指符号学”(sémiologie de signification)。在这一点上,人们曾经把拉康(Lacan) 1953 年宣布“返回弗洛伊德”的时候采用的所指在上、能指在下的图示当作其转向“意指符号学”的重要提示。其实,拉康采用的图示,只不过是还原了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160 页上原本就有的图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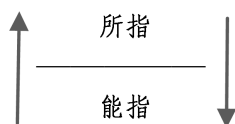


图 2

笔者想指出的是,人们长时间以来将这种名称下的符号学理解为不大过问“意指”而更侧重“符号系统”的符号学。这种理解,到了写作《结构主义史》的多斯(Dosse),他根据后来人们都转向了 sémiotique 的定名,而将 sémiologie 另称为 sémiotique structurale,即“结构论符号学”,以此区别于 sémiotique。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也采用了多斯的这个名称。现在看来,又需要从汉语的译名上做出改动,原因是,坚持使用 sémiotique 这一名称,并从研究内容上大大区别于索绪尔之定名的巴黎符号学派,在其后来的文件中,也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因此该学派的符号学也是“结构论的”符号学,比如法国符号学会在 2017 年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以“今天的格雷马斯,结构的未来”为主题举办的纪念格雷马斯诞辰 100 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也宣称由格雷马斯创立的符号学是“结构论符号学”,笔者发表在 2020 年秋季号《符号与传媒》(总第 21 期)的《话语符号学:从韩蕾的〈论巴尔特〉谈起》的文章中,曾援引了此次会议相关材料中的文字:“格雷马斯——在其对于意指的分析中以最为稳定的方式展示了结构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他的研究工作在于以这位学者特有的纯真来过问意义的出现和塑造我们对于

世界的感知方式。”会议的讨论问题之一是“一项在时间延续中的科学计划:继承、后继和转换”,主要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项科学计划的结构主义的后续研究工作,并做出评价。笔者惊异地看到,该材料在总称为 *sémiotique* 的名下,对于所涉及的特殊学科的符号学,仍然使用了“*sémiologie*”一词,这说明巴黎符号学派学者们现在已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尽力使自己与后者分开,而是予以了接受。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在汉语译名上如何区分这两个符号学名称的问题。鉴于巴黎符号学派的权威学者、格雷马斯的亲授弟子丰塔尼耶在其《话语符号学》(*Sémiotique du discours*, 2016)一书中也多次提及索绪尔的符号学是有关“系统”的符号学(Fontanille, 2016: 28),所以,笔者在此文及以后也将 *sémiologie* 在汉语上的译名上改为“系统论符号学”,而将 *sémiotique* 的汉语译名确定为“叙述论符号学”。那么,将 *sémiotique* 一词定名为“叙述论符号学”有何依据呢?笔者在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和专著里曾将其在汉语中定名为“巴黎符号派符号学”,但这种名称无法明确地显示在这种名称下的符号学研究特点,于是便重温格雷马斯的相关著作,我记下了作者曾将其表述为“叙述语法”,也看到了作者于1973年发表的《一个叙述性 *sémiologie* 问题:价值对象》文章。该文在收入其《论意义 II》(*Du sens II*, 1983)时,这一题目中的 *sémiologie* 就改为了 *sémiotique*,于是那篇文章的题目便成了《叙述论符号学问题:价值对象》。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符号学的这两个名称有过混用阶段,或者说过渡阶段。我由此为“叙述论符号学”的汉语定名找到了比较可靠的依据。后来,我过去的一位学生——当时尚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符号学博士的王天骄先生——发给了我他看到的格雷马斯祖籍国维尔纽斯大学尼乔勒·盖尔斯伊特(Nijolė Keršytė)先生用法文写的发表在2008年第五期《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协同》(*Synergies pays Riverains de la Baltique*)杂志上的文章《话语的相互作用:在叙述论符号学与叙述学之间》(*Les interactions entre sémiotique narrative et narratologie*),这就更强化了我使用“叙述论符号学”这一汉语定名的意愿。这样一来,由于两种符号学名称都有着“结构论”的内涵,所以,我们在“系统论符号学”和“叙述论符号学”两个名称之上,再将它们总称为“结构论符号学”就很妥当和好理解了。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为在这一过程中并不依靠语言学理论而形成的“叙述学”说上几句。叙述学也是在法国结构主义或符号学研究初期出现的一个分支,在笔者看来也可以将其称为“系统论符号学”,因为它所研究的是作为符号的“词语显示”(manifestation des mots)的“修辞学系统”,按照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安娜·埃诺(Hénault)的说法,迪克罗(Ducrot)和托多罗夫在他们合作主编出版的《言语活动科学百科手册》(*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s sciences du langage*, 1972)中明确表示,他们“不同意离开词语领域,并把它们对于言语活动(langage)的理解局限于自然语言的狭窄和平庸的意义”(怀宇,2019,主编者前言:8)上,因此叙述学不属于基于语言学研究的一种符号学。这里说的“自然语言”就是指各种语言事实(例如汉语、英语、法语等)。所以,叙述学的学者们称他们的学科既不是“系统论符号学”,也不是“叙述论符号学”,便依据于此。叙述学与结构主义有关联,却与语言符号学没有关系。

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和新的方法论探索,法国结构主义活动(包括初期符号学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后,到了60年代达到顶峰,其间出现过多种方向的探索,但从总体来看,这些方向研究还是没有脱离“系统论符号学”范畴,因此,我们可以说,“系统论符号学”和随后的“叙述论符号学”代表了法国符号学研究的总体发展脉络和不同且有联系的两个阶段。

5 两种符号学研究的比较

概括说来,“系统论符号学”主要是以符号单位的“不连续性”(discontinuité)为研究对象,而“叙述论符

号学”则以符号单位之间的关系即“连续性”为主要研究内容。

虽然“系统论符号学”作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总体上已经过去,但是,其研究过的内容和其对于法国符号学发展的贡献,还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似乎可以为其做出这样的总结:

(1)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及其后续的发展,是系统论符号学产生的语言学基础,“二元论”是其基本出发点;索绪尔将“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将语言符号分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语言的基本结构是横向的“组合关系”和纵向的“聚合关系”(联想关系),是系统论符号学的主要操作概念。这些概念对后来法国符号学的发展均起到了奠基作用。

(2)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将“语言”看作“形式”、看作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看作是语言研究的对象,从而使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系统论符号学将其研究集中在符号、符号系统和被研究对象的总体结构上;在系统论符号学看来,文化是一种“结构集合”,文化产品的共同特征是系统论符号学的研究主要兴趣所在。

(3)在研究方法上,系统论符号学将其任何研究对象都转换成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概念和由语言符号组成的“形式系统”;在研究单位上,它几乎不跨越句子,而是通过对句子的切分再从聚合关系上找出相关成分的共同特征,正如巴特所说,“结构主义活动包括两种典型操作:切分与组配”(Barthes, 1964: 216),所以,它基本上是对“不连续”成分的研究;系统论符号学被看作是语言学的一种“附属”,是有其道理的。

(4)在1968年的“五月运动”的冲击下,结构主义进入“后结构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的系统论符号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人们已不再纠缠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而是将其看作一个整体,这是德里达解构论(déconstruction)带来的结果;二是被结构主义所摒弃的“主体”在后结构主义时期又出现了某种返回迹象;三是开始研究“语言”的对立面“言语”,认为由“言语”构成的“陈述语段”也像“语言”那样影响语言的形式系统和“意指系统”,从而开始了由“不连续性”向着“连续性”即“文本”或“话语”的过渡;四是文化不再只被看作是一种“结构集合”,也被看作是一种“实践”(praxis)。根据这些特征,巴特和福柯的后期研究、阿尔都塞和克里斯蒂娃等人的研究,以及哲学家德勒兹、博德里亚等有关符号学的思考,都属于后结构主义,而这也恰是结构主义结束、真正符号学研究步入正轨的阶段。

到20世纪70年代,“系统论符号学”已被“叙述论符号学”所逐渐代替。我们仍然借用上面援引的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42页上的图示来说明一下叙述论符号学研究的内容,并对于其研究工作做出概述(见图1)。

“叙述论符号学”不像“系统论符号学”那样,把自己的研究限定在语言即其“共时态”方面,而是把“言语活动”的全部要素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这样一来,其研究对象的范围就扩大了,既包括了“系统论符号学”的研究内容,也扩大到了整个文本、整个话语以及“非语言世界”。在此,笔者只想对其宏观理论主张与其特征作一点概括:

(1)在“叙述论符号学”看来,符号学应该是关于意指系统的一般理论,其研究对象是任何言语活动的“意指系统”即“承载意义”的组织机制,包括正在构建和变化之中的意蕴集合体,而不局限于符号本身的性质及其类别。在一段时间内,该学派认为符号是一种已经构成的对象,而不再是可观察的对象。

(2)符号学是一种有关“元语言”的等级系统。元语言是一种词语确定和单义的语言,它可以描述自然语言,也可以描述非语言事实。这种元语言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描述层,即运用符号学理论对

言语活动对象进行理解和赋予其形式的层次;二是方法层,即对描写层采用一定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的层次;三是认识论层,即检验在第二层上使用的方法与模式是否具有“匀质性”和“一致性”的层次。当然,对于不同对象的分析,所采用的适宜层次也是有别的。但不论采用什么层次结构,这种分析都主要是对“叙述结构”的分析,格雷马斯把巴黎符号学派的研究概括为寻找“叙述语法”,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的“叙述学”。

(3)巴黎符号学派认为,各类言语活动都是它的研究范围,而言语活动对象有两种能指整体:一种是自然语言构成的“词语世界”,另一种是由自然世界构成的“非词语世界或超语言世界”,即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交流方式。因此,一种普通符号学应该包括这两种言语活动对象。这时的符号学,已不再纠缠于“语言学属于符号学”还是“符号学属于语言学”,而是将两者融为一体并以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意指表达形式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所以,格雷马斯与库尔泰斯合著的有关符号学的词典就名为《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

(4)普通符号学的研究材料是“文本”(texte),文本被看成是一种或多种意指系统,它可以是写出来的,也可以是口头的,甚至是空间的;它可以是词语性的,也可以是非词语性的。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人们更喜欢采用“话语”(discours)一词来代替“文本”。再早一些时间,人们把“文本”只看作是“表达之实质”,因此它是“陈述语段”(énoncé,即句子或句段)接续的结果,是以文字形式出现的;而话语被看作是“言语”的产物,被看作等同于“过程”,格雷马斯说过:“初步探讨时,我们可以将话语概念与符号学概念等同看待,并将位于言语活动组合关系轴上的所有符号学现象(关系、单位、操作)都看作是有关话语的理论。”(怀宇,2019:93)似乎,“文本”更表现为静态,而“话语”则表现为动态。但是,由于某些欧洲语言中并无“话语”这一单词,所以,便用“文本”来代替“话语”,同时保留“话语”的概念,从这种意义上讲,两者又成了同义词。不过,从巴黎符号学派来看,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话语”这个词及其基本概念,因为它还可以构成“动态的话语”(discours en acte),即它可以与“话语”之外的“语言外现象”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无限的”符号学实践过程。由于“话语”更表现为动态,所以,“话语”中的“陈述活动”(énonciation)便成了中心概念和主要操作内容。

(5)叙述论符号学的研究以“连续”的语料,甚至是语料之外的背景为考虑对象。按照叙述论符号学者们的说法和经验,这种符号学也包含着对于“系统之出现和图示化过程”的研究,“而特别是包含着根据对可感世界的感知而为该系统建立形式的过程——当然,只有不连续性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可理解性只有在考虑引导不连续性的过程时才完全可能”(Fontanille,2016:11)。叙述论符号学在注重过程研究的同时,照样可以处理系统论符号学的符号系统问题。再者,如果说系统论符号学过分依附语言学概念和理论的话,那么,叙述论符号学则明显地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有所区别,或者说是对于传统语言学在全新领域中的拓展,这就使得符号学研究以后成为独立学科成为可能。

叙述论符号学最初是作为系统论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出现的,后来成为独立学派,至今已近40年。在格雷马斯去世后的几年里,这一学派曾出现过“群龙无首”的局面,格雷马斯当时身边的合作者也分别奔赴各处,一时让人对其未来感到担忧。但是,不久之后,这些合作者就在各自所在大学带起了一大批新的学员和研究者,形成了“遍地开花”之势,从而扩大了符号学研究的队伍和领域,使人们复燃了对于这一学派的希望,逐步形成了“后格雷马斯时代”的符号学研究潮流。这一潮流在继承格雷马斯理论的同时,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领域,建立起了以主体、文化、感知、张力为主要对象的符号学研究。这一

点,我们从埃诺主编的“符号学形式”丛书的出版规模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增多、理论探讨不断深入之中可以看出,而且法国符号学研究队伍的“新生代”也初步形成。目前,该学派以不同名目建立的研究中心几乎遍布法国各所综合性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以利摩日大学和里昂第二大学的研究中心最为著名,成果也最为显著和丰硕。

6 展望

在经历了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法国符号学(我们知道,这一提法现在以 *sémiotique* 一词来代表)已经成为世界符号学研究中的一支劲旅。纵观其走过的历程和当前继续作出的努力,我们尝试如下展望:

(1) 法国符号学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已经站稳了自己的脚跟,它不仅没有像格雷马斯 1973 年在第一届“空间符号学”研讨会上所悲观地预言的那样,说“符号学也许是一种时髦问题,并不排除在三年以后人们不再谈论它”(Coquet, 1982: 5),反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具有了初步的自立地位。法国的综合性公立大学在语言科学部门中几乎都有了符号学教学;不仅如此,一些符号学分析方法也已进入中学的语文教学之中。符号学专业性学会和全国性学会也已出现多年,出版物数量也已达到可观的水平,并在继续增加之中。可以预测,法国符号学的研究领域会越来越宽广,其成果也会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学科之中;笔者注意到,法国符号学研究越来越贴近现实,开始以比较自立的身份过问和紧扣时代课题,比如法国符号学学会在 2022 年 4 月 4-7 日于利摩日大学举办的会议,其中心论题便是“转变:生态转变、数字转变、社会转变和人类学转变”。

(2) 回顾法国符号学走过的道路和其取得的成就,除了其使我们对于符号及其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之外,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似乎集中在了两大成果方面:一是在结构主义思潮中诞生的叙述学,这一学科已为各国所接受,并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中得到了丰富,业已进入了独立发展的阶段;二是话语分析或话语符号学,它是巴黎符号学派在格雷马斯符号学理论上集体努力的结果,这一学科正在替代符号学分析这一名称,有时甚至直接指代符号学。也许,这后一方面是我们今后要努力去了解和引进的。应该说明的一点是,法国的“话语分析”(analyse du discours),在名词使用上,就是英美学界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就使用的“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但是,它们的分析内容有所不同:法国的“话语分析”依据“语义学”和“叙述语法”,侧重于意指和意指方式,即叶姆斯列夫主张的“内容之形式”的分析,英美的“语篇分析”攀附于语言学而侧重于语法与逻辑结构(例如衔接、复指、句子间连接性等)的分析。

(3) 如今,巴黎符号学派即叙述论符号学已经成为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而且它已经将系统论符号学的研究包容了进来,并以 *sémiotique* 作为统一的符号学名称,从而涵盖对于符号及其系统和对于意指方式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任何科学研究都有发展阶段的划分与综合的过程,最初的名称不一致和概念不统一,恰好说明该学科尚处在初创阶段,它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完全的综合在法国尚需时日。不过,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一些巴黎符号学派的学者已经开始从事普通符号学教材方面的研究与撰写,例如库尔泰斯和丰塔尼耶,他们的教材中都是以论述符号的定义和性质为起步,逐渐进入对于意指和意指方式的研究。丰塔尼耶的《话语符号学》自 1999 年初版后,更是经历了 2003 年、2016 年两次的修订再版。

(4) 近年来,不少法国符号学家开始引入和研究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Peirce)的理论,并尝试将源于

索绪尔传统的研究与源于皮尔斯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符号学研究的必然,也是人类认识过程逐渐趋同的一种必然。在这一方面,埃诺主编和参与撰稿的《符号学问题》一书中,在分别介绍了源于索绪尔传统和源于皮尔士传统的两种符号学的成就之后,专门有一章谈到了两种传统在音乐符号学中的“汇合”。更为可喜的是,我国符号学研究者也结合我国自古至今的符号学思想,已经积极地做着梳理和综合各种符号学理论的研究工作。我们期待看到更多这种“汇合”的新成果。也许,在各国学者进行大量综合研究之后,符号学才会真正获得广泛认同的独立地位。在这一点上,符号学今后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 Baroquin, N. & J. Laffitte. 2007. *Dictionnaire des philosophes*[M]. 3^e édition, Paris: Armand Colin.
- Barthes, R. 1964. *Essais critiques*[M]. Paris: Seuil.
- Benveniste, É. 1966.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I*[M]. Paris: Gallimard.
- Benveniste, É. 1974.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II*[M]. Paris: Gallimard.
- Coquet, J. -C. 1982. *Sémiotique: École de Paris*[M]. Paris: Hachette.
- Doss, F. 1992. *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M]. Paris: La Découverte.
- Fontanille, J. 2016. *Sémiotique du discours*[M]. Limoges, Puliim.
- Foucault, M. 1966. *Les mots et les choses*[M]. Paris: Gallimard.
- Greimas, A. J. 1985. *Des dieux et des hommes*[M]. Paris: PUF.
- Merleau-Ponty, M. 1960. *Signes*[M]. Paris: Gallimard.
- Mounin, G. 1970. *Introduction à la sémiologie*[M].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Wahl, F. 1973. *Le structuralisme en philosophie, Qu'est-ce que le structuralisme?* 5[M]. Paris: Seuil.
- 埃诺. 2019. 符号学问题[M]. 怀宇,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格雷马斯, 库尔特. 2020. 符号学: 言语活动理论的痛是思考词典[M]. 怀宇,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吉罗. 1988. 符号学概论[M]. 怀宇, 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索绪尔. 1982.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文中未标页码出处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French Semiotics

ZHANG Zhiting

Abstract: French semiotics has alway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semiotics research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from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various cultures, the origi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French semiotics, in order to not only explain the two kinds of research contents which have taken shape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former and the last period, but also to give my own views on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semiotic names created during the two periods.

Key words: semiology; semiotics; communication semiology; structure; signification

责任编辑:冯革